

第六章 「中法西用」思想

的历史作用和意义

通过前五章，依照历史顺序，本文已经讨论了从早期的魏源、冯桂芬到晚期的维新派法派的「中法西用」思想。在此本章拟综合起来对他们的思想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做一个判断，这是研究「中法西用」思想不能逃避的责任。

在本文的第一章里，已经对「法用」论和

法用论

法

法

“通器”论作了专门讨论。在此必须再次指出，这种讨论便了解「中法西用」论中“法”与“用”之间的关系，而能证明这样的关系在理论与历史上有效。

从前面的讨论中，可以了解「中法西用」思想由于人物和时期的不同，有所差异，但是其基本理论是希望引进“西用”，以防护和强“中法”。然而就历史的条件而言，其主旨固然是为了着重于防护和强，同时强调“中法”的不可能性。至于在用的层面上，接受西文文比

也仅止于“用”的范畴，而不是在用的层面
 上全面接受西学文化。在另一方面，他的对“
 译用”的看法是不一致的，认为“译用兼晓”或
 “明译达用”，不以为“译用”可以分离。

不过如前所论及的严几道，对“译用”则见
 解独特，不同意「中译西用」样式，认为中西
 学的差异，就“如具物人之面目然，不可强谓
 似也”，由于“一译”有“一用”，所以“中
 学有中学之译用，西学有西学之译用”，“分
 之则两立，合之则两亡”，就好比“以中为译

西学

以

西学

，以马为用”。（注1）其实，这一说法，早
 以郑观应便认为西洋本身就是“译用兼晓”的
 ，而俞樾观点也有此观点。如果回到朱子对“
 译用”论来看，在某种意义上也承认“译”有
 自身的“译用”；“用”也有自身的“译用”，
 但不一定会影响“译”与“用”关系的存在。
 这种理论为“中译”与“西用”的结合提供了
 依据，使「中译西用」论者借“西学（源出中国）
 说”和“托古”理论，使“中译”与“西用”
 有了关联，而非“译用”截然分开。

回顾「中学西用」思想的发展过程，必须从中国近代的脉络来观察，在「中学西用」理论提出之前，魏源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可说是主张学习“西技”的最前理论。而冯桂芬的「中学西用」思想则更进一步主张“采西学”，在当时更加已意味着承认在中学之外尚有西学的存在，并主张加以学习，同时由学习“西技”到“采西学”，也提供了扩大西用范围在理论上之可能性，而在历史的发展中，也说明此一可能性不仅可能，而是事实。

馮 桂 芬

批

馮

但是早期的「中学西用」论者在当时中国的官僚和士大夫中仍占相当少数，当冯桂芬写成《采西学疏》以后，连身为曾国藩幕僚的赵烈文都认为“全书精当处，皆将表洁”，（注2）而在写成的十多页才正式印行。至于郭嵩焘由于对西学的认识超过同时代的人很多，他的《使西纪程》被下诏毁版，死后也没有得到赐谥立传。（注3）而李鸿章在光绪二年（一八七六年）也曾透露时人“物议、灰议”“谤言”，但在这种情形下，他又担忧地“若亦不

说，天下赖以不致支持”。（注4）由此说明
了早期的「中法西用」思想，仍只被少数官员
和读书人接受，而它的落寂对于社会风气的
转变，有一定程度的作用，并且其思想的旧的
基础在于接受“西法”以补充“中法”，但从
中国近代史的发展来看，它的意义在于接受“
西法”。

但是甲午战争后，“朝野乃知旧法之不足
恃，于是求变法者日众”，而“天下之士咸
知变法，风气大丕矣”，（注5）便使新变法

思想

抵

抵

思想成为学习“西法”的主流，而清室运动至
此已经破产。此时「中法西用」思想发展进入
到一个新阶段，一方面当变法思想成为主流后
，「中法西用」已经不再是接受“西法”的最
前思想，另一方面，「中法西用」思想除了
继续的具有导入西法的功能外，对于进一步限
制引进超越「中法西用」格局的西法，显得越
来越明显，这就是对权变法，反对维新，而正
维新派和守旧派之间以斗争就是继续此一思想
而发展。于是十分清楚，在中国近代思想史

的脉络中，「中法西用」思想具有重要的意义

但是以一八九〇年代的中国政治形势和社会环境来观察，「中法西用」思想是否有效的呢？根据以往学者的研究显示，在当时情况下继续推动一八九〇年代“自强运动”（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官僚掀起的一场以加强军事建设来强国的运动）以来的改革路线，比起推行强有力的计划要容易得多，而「中法西用」思想在理论上也具有与一八九〇年代政治情况相吻合的便利。这从当时主要掌权者慈禧太后的意见来观察，似乎是可以同意的。自从辛酉（一八六一年）政变以后，慈禧太后在中国政治的决策上，拥有很大的控制权，整个洋务运动的推动如果没有她的同意和支持，多数洋务派官僚与「中法西用」论者的主张，根本上是无法成立的，甚至能否贯彻仅时的言论，都是一大问题。而慈禧太后当时阅过《校邠庐抗议》一书后，“亦称其剴切”，而只是强调“勿操之过急而已”。（注6）在另一方面，这样的改

革理论，也是当时独一无二、孙家鼐所赞成的，因此左理论，所以得到他的支持，甚至美的《翼教丛编》版「中法西用」论者的支持。

事实上，「中法西用」思想在改革计划中的实践，在庚子（一九〇〇年）以前清廷的改革中所以看出，所以从当时在社会各个层面所收到的调查中所看出，至于这样的改革对当时的中国而言，究竟产生多大作用，则仍然是一个尚待探讨的问题。

此外，还有为军代表的文法维新派在学习

西方的问题上，和维多派与「中法西用」论者有紧密的联系，从对西学的认识和引进的深浅程度，他的是一种新的继承与发展的关系，他的在思想上的冲突与对立均是建立在同一思想

（「中法西用」思想）基础上的。如梁启超所指出的，“若魏默（源）、郭筠仙（嵩焘）、曾纪刚（纪泽）诸先生，为中土言西学者所自出焉”。（注丁）又说文法维新派能够藉以接触得到西学的知识，大都来自译书派人物主持翻译出版的书藉。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中

「西国」思想所以成为他的思想启蒙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这也是本文为何将维新运动时期的「中法西国」思想单独作为一章来讨论的原因。

不过从整个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脉络来看，早期的「中法西国」思想与承袭魏源“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思想，而启浪、译、严的变法维新思想，后者早期「中法西国」思想一脉相承的晚期「中法西国」思想则又和浪有为等文法维新思想在“中法”的绝对性上有所冲突，是则显而

思想史

批

11111

以确立的，特别是严东从西学看中学的新观点的出现。但是截至此，无论是译多派、早期「中法西国」论者；还是晚期「中法西国」论者，或是文法派，对“中法”存在的合理性均毫不置疑，所以从「中法西国」思想的角度来看，他们的都是一条线上的，都同意改良，而非改革。

综本文所述，自鸦片战争，强盗开港以来，打破了中国闭关锁国的状态。在这种历史

背景下，一方面面对西方的挑战，被迫有所回应；一方面由于“经世”思想的影响，使得有识之士主张主动接受西文之化，了解西方。从一八六〇年以来，这就使“中学西用”思想成为中国接受西文之化的主流理论。

如果简要概括“中学西用”思想理论的特点，可以说早期的“中学西用”理论的特点，是在于提供接受“西学”的理论支持，而晚期的“中学西用”理论，则除了上述特点外，尚有一项特点，即与接受“西学”可能危害我已

思想

据

据

经危害到“中学”的主张对抗，并加以压制。

但是不论前期或是后期的“中学西用”思想，其理论的基础是在于“学”不当而“用”所受，期望引进“西用”来防卫、补强“中学”，甚至于更进一步以“西用”为手段，使“中学”进一步成为世界的道理。在这样的基础上，纵使“中学”退缩到“编理道德”层面，由于其本身是行为的标淮，所以实际上一样也限制了制度改革的范围，因为无论制度是否有意识地被纳入“学”的范畴内，限制与政治和

社会制度运作原则的“恭顺编理”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在“恭顺编理”不变的前提下，体制的根本变革是根本不可能的。所以若以“传统”不变为前提，从事西化（改革）理论，无论早期的也好，晚期的也罢，都似乎属于保守主义的花园。

至于为何以“传统”不变而“利用”新的态度，在“利用”的范畴内接受西学，其理论的根本似乎主要是来自“经制教学”和其中官家朱子学“理”的绝对性思考方式，因而使“用”与“理”

照编线

抵

抵

气”相关联的“道器”论、“经用”论思考模式。从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发展来看，当面对西学的冲击，感觉有必要采取部分西方文化时，

「中体西用」论者，在其熟知的“经制教学”系统中，主动地接纳而不以支持此一行动的“理气”论是不可以理解的。反过来说，在经由“经制教学”的社会化过程中，已赋予其“理”绝对性的概念，而如同前所指出的，在“经世”思想中，也有“价值理性”高于“工具理性”的特性，因此，“工具理性”的运作不应该抵

融“价值理性”，而在当时既存体制之下，所谓的“价值理性”指的是儒家思想的社会秩序、规范或是“圣人之道”，因此其接受“法”不受而“用”所忌的态度是不以理解的。

然而根据本文所探讨的范围内的「中法西用」诸中，依据前文的讨论可以得知郑观应的“西用”范畴显然较其他人广，且其「中法西用」思想中也有多方面具备突破「中法西用」思想格局的可能。另外，张之洞的「中法西用」思想，虽然在时序上较后，却在“西用”的

图稿续

撰

1886

范畴上显得较为狭小，这或许与他当时的身份有关，但如从实践性作为衡量标准的角度来看，特别是在教育实践方面，则张之洞的“西用”范畴无疑最大。当然，最后值得强调的是法有力、语词同知声东等文法派的「中法西用」思想。因为无论如何说他在更多方面更具突破性如开放性，即便「中法西用」思想中的“中法”范围越来越小，几乎甚至于道德领域内，而在政治领域内完全被西化理论替代。

由于「中法西用」论在接受“西学”上，

实际上是依据“体”不变而“用”不变的理论结构，因此当「中学西用」编者期望“不同景照”时，为了维持理论架构的完整，便多以“西学源出中国说”或是“托古”的“古已有之”观念，作为媒介，使得“中学”与“西用”之间产生关联。问题是一旦“西学源出中国”说或是“托古”说在缺乏事实的支持而丧失功能时，「中学西用」思想的“真值”便面临被否定的命运。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在本文讨论的范围内，甚至至清朝末已为此，「中学西用」

图稿纸

图稿纸

「中学西用」编者所提供接受“西用”或改良的蓝图，依然有待进一步的实施。因此无论肯否「中学西用」思想推动改良的路线，甚至要再进一步的西学或改良也好，「中学西用」思想仍具备有一定程度的实际促进功能，这一点在日后的社会实践中是显而易见的。

大体而言，从曾、李掀起的自强运动开始，「中学西用」思想的落实确实已在近代中国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影响。译务所推动的新式工业建设，虽然问题甚多，但是在中

国近代的启蒙与救亡，毕竟创立维新地多，为它留下了一些成果，特别是在中国近代的启蒙史的发展脉络中，其承先启后的实际作用和功能，在历史上是不容抹煞的。

此外，对于「中体西用」思想中最具有积极影响力的，而又得到正面肯定的，一方面是对观应、汤震、陈旭、张之洞等人的教育主张和教育思想，对于废科举推行新式教育，引进西学，「中体西用」论者更是功不盖过，所以肯定中国新式教育的基础和规模莫不由他所奠定。

另一方面对后来历史最具有直接影响力的，而又兼具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的，当推十九世纪末出现的受法维新派，特别是严宗适运用的以西学看中学的全新观点，为其在政治上提出「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的主张提供了科学基础，并同时在治学上强调科学的精神和科学的方法，对后来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更明确地提出「民主与科学」的口号有直接的借鉴作用。

当然，在讨论「中体西用」思想的过程中

，仅从其思想本身加以探讨是不够的，而必须将其放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加以判断，这就使人感到它本身是一种具有十分浓烈的折衷主义色彩的思想，事实上也是如此，折衷主义是「中道而用」，福泽昭堂的特色。因此必须指出，靠它来开拓中国适物学、民主之路是绝对不可能实现的。

注释

注1：尹东：《与〈对外报〉主人书》，
 见：福泽昭堂

《尹东集》，第三册，第五五八～
 五五九页。

注2：赵烈文：《能静居日记》，（台北，学生书局，民国五十二年版），
 第一一二五页。

注3：郭廷以等编：《郭谱》，第六六六
 、一〇〇九页。

注4：李鸿章：《霁刘仲良中丞》，《刚
 像函稿》，卷十六，第三页。

注5：梁启超：《戊戌政变记》，台北，

中华书局，民国五十八年版，第二
二页。

注6：费行简：《慈悟传信录》，《戊戌
变法文献汇编》，第一册，第四二
四页。

注7：梁启超：《南学会叙》，《戊戌变
法文献汇编》，第四册，第四二二
页。

——完——

原稿纸

第 页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第一稿

一九九〇年三月，第二稿

一九九〇年七月，第三稿

旅（澳）川唐梁